

【发表于《财贸经济》2007年第11期】

## 闲暇时间与消费增长

—对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

魏翔 惠普科

**内容提要：**新古典观点认为闲暇时间的增长会“挤出”产出，进而不利于宏观消费的增长，二者存在负向关系。针对于此，本文首先构造了包含闲暇时间的闲暇时间—消费函数，从静态角度分析了闲暇时间对居民消费的影响，进而在动态的预算约束下通过最优化模型证明了闲暇时间与消费增长间不但存在负向关系而且存在正向关系，取决于参数环境影响。之后，本文引用中国的实际数据检验了理论模型的命题，并发现中国的闲暇消费对宏观消费具有正向拉动作用，这说明中国的消费结构和消费质量正在得到改善，也说明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展现出一定后工业化倾向，本文对此进行了解释。

**关键词：**闲暇时间 消费增长 产出率 动态分析

中图分类号 F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 一、引言

最早致力于闲暇研究的学者有凡勃伦 (Veblen, 1899)，庇古 (Pigou, 1920)、奈特 (Knight, 1921) 和罗宾斯 (Robins, 1930) 等，他们无一例外地把闲暇作为工作的对立面来进行研究，构建了经典的收入—闲暇模型。在此框架下，大多数学者都认同闲暇作为一种普通商品的概念。20 世纪中叶，贝克尔 (Becker, 1965) 突破了传统的思路，他认为家庭要考虑的不是怎样在工作与闲暇间选择，而是要考虑在不同消费活动间的选择，以及市场活动时间 (工作) 与非市场活动时间 (闲暇) 的最佳组合如何使消费者获得最大效用。

出于将闲暇定位为工作替代品的考虑，西方学者主要从两个方向上展开对闲暇的研究。一个方向是将对闲暇时间的研究重点放在闲暇时间对劳动供给的影响上。邓恩 (Dunn, 1975) 通过数据调查建立了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闲暇模型，提出了包含工作福利的工作—闲暇效用函数<sup>①</sup>。斯沃福特和惠特尼 (Swofford and Whiney, 2001) 研究了闲暇和劳动供给的关系。施默尔 (Shmuel, 2001) 关注了在劳动供给中工作与闲暇对劳动者的不同效用，认为工作的负效用必须计入总效用函数，并且由此导出工作时间和闲暇时间的有效分配。另一个方向是研究闲暇时间对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影响。

研究闲暇时间对消费影响的基本思路来源于新古典主义对消费者时间配置和跨时消费的分析 (Hirsleifer, 1970; Bliss, 1975; Becker, 1976)，经济学家们调整了对消费者约束条件的视角，在静态地考虑消费者所面对的预算约束外，填加了时间约束条件，或是将消费时间引入效用函数，重新分析消费者的效用和行为，及其对消费增长或经济增长的影响。由于不同学派和不同学者建立的效用函数和约束条件不同，得到了不尽相同的结论。布坎南 (Buchanan, 1994) 认为，当人们的闲暇消费欲望和数量减少时 (如减少外出度假和旅游的时间)，将导致对规模经济的更大利用，

<sup>①</sup>可惜的是，邓恩在他的专著中没有继续研究工作福利的来源以及对工资率的影响。

因而能提高生产率，即闲暇时间和经济增长有反比关系。针对布坎南的观点，一个强有力的争辩来自于刘孟奇 (Lio, 1996)，他在新兴古典的分析框架下，只有当人们对消费品多样化的需求不强烈时，布坎南的论点才成立。而当人们对物质消费多样化的欲望很高涨的时候，人均闲暇消费、人均物质消费、人均居民总消费、人均真实收入和生产率会同时提高。同时，刘的经验观察 (Lio) 和杨小凯 (Yang, 1998) 的一般均衡超边际比较静态分析也对上述观点提供了支持。

还有一些学者从另外的视角，研究闲暇效用的传导机制及其外部参数环境。例如，欧蒂吉拉 (Ortigueira, 1998) 提出有效闲暇的概念，用货币价值衡量闲暇效用，进而重新研究了闲暇时间对效用的影响。莫里斯 (Morris, 2001) 则证明，由于工资率的提高，任何理性工人都会增加劳动供给，从而减少对闲暇的消费，从而，传统的效用模型不能很好的说明闲暇对效用的影响。诸如此类的研究表明，闲暇时间以及外部参数对闲暇消费，进而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相对于西方，我国学者更多地在闲暇与需求的关系上展开研究<sup>②</sup>。张旭昆、徐俊 (2001) 把商品细分为耗时性商品和瞬时性商品，证明闲暇时间的增多，对耗时性商品的消耗便会增加，这将引致对旅游、体育、娱乐消费需求的上升。郭鲁芳 (2004) 则建立了引入家庭生产函数的闲暇消费模型，以此论证了，达成局部均衡的条件是家庭工作的边际生产率等于物品和消费时间的边际替代率。这些研究结果基本上支持刘孟奇的观点，而与布坎南的看法不一致。

综观国内外的研究，各学派和各学者对闲暇时间对居民消费以及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到底是正向的还是负向的持不尽相同的观点，由此分化出各种论点和争论。对该问题进一步地加以研究，尤其是通过理论分析和实际数据两个方面弄清楚我国从工业化社会向和谐社会过渡的过程中闲暇时间的效应方向，对于深化理论研究和指导政策实施都具有生动而实用的意义。

本文通过对先行研究的分析，我们得到一个初步判断：闲暇时间对居民的总体消费可能存在正负两个方面的效应，对居民消费即有“挤出效应” (crowding-out effect)，也有“挤入效应” (crowding-in effect)，具体效应方向将受到效用函数形式和外界参数的影响。据此，我们可进一步论证闲暇时间（主要是能给消费者带来身心享受的闲暇时间）对居民消费效应影响的具体作用形式，并对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基本结论，以证明和检验我们的初步判断。本文的结构如下：

第一部分对国内外休闲研究领域的观点进行了简要综述，提出了休闲时间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假设，即“挤出效应” (crowding-out effect) 和“挤入效应” (crowding-in effect) 并存。第二部分研究闲暇时间对消费的静态影响，证明了闲暇时间对消费总量的影响同时存在挤入效应与挤出效应。第三部分纳入消费者的效用最优化行为，并对第二部分的模型进行了动态化，进一步论证了第二部分的结论同时凸显了结论成立的外部参数环境。第四部分根据中国 1987-2003 年的数据基于 VAR、VEM 和回归方法进行了计量检验和实证研究，分析了闲暇时间对城镇居民总体消费的效应。第五部分是结论和政策建议。

## 二、闲暇时间对居民消费的静态影响

在闲暇经济里，闲暇产品的消费就是对闲暇时间的消费，而闲暇时间形成对工作时间的替代，会影响经济行为人的收入水平，同时，闲暇时间的多少也通过影响行为人的效用水平影响其生产率或工资率，进而从另一个侧面影响行为人的收入水平。收入水平最后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消费水平。所以，在研究以生活质量为本质特征的、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或和谐社会过渡的过程中，有必要将消费者的闲暇时间同时引入消费函数<sup>③</sup>和约束条件中。

本文对闲暇时间影响经济行为人人行为效率的一个突出看法是，闲暇时间对行为人的工资率会

<sup>②</sup> George Fisk, (2001) “Toward a theory of Leisure-spending behavior” 曾对闲暇消费的需求做过研究。

<sup>③</sup> 家庭经济学考虑了各种消费的时间禀赋约束，提出了包含时间价格在内的商品“全价格”概念 (Becker, 1965)，但是，它并没有区分物质消费和闲暇消费，因此无法揭示当闲暇消费成为不可忽视的消费成分时对整个消费活动的影响。

产生直接影响。我们令  $b(z)$ <sup>④</sup>代表闲暇时间对工资率的影响函数，该函数的直观意义是，由于闲暇时间使消费者通过休闲、受教育、康体娱乐等活动增进知识、放松精神和提高能力，因此能够提高行为人的人力资本的边际产出和劳动边际产出，而在竞争性经济中，劳动边际产出和人力资本边际产出的提高能直接增加总产出<sup>⑤</sup>（Solow, 1956; Arrow, 1962; Uzawa, 1965; Romer, 1986; Lucas, 1988），同时，在竞争经济中，按劳动边际产品等于工资率为劳动者付酬，所以，闲暇时间的增长能促进个体工资率的提高，也能促进总产出的提高。如果闲暇时间对行为人来说具有正效用，则闲暇时间能够直接或间接地提高行为人的边际产出，进而促进行为人的工资率提高，此时  $b > 1$ 。如果闲暇使行为人滋生了懒惰或消沉等情绪，则它也会通过降低行为人的边际产出来降低行为人的工资率，闲暇的这种负作用<sup>⑥</sup>用  $b < 1$  表示。但是，实际中，理性的行为人无论如何不会（过度）使用自己的闲暇时间而造成自己的工资率变为负数，因此，必然有  $b > 0$ 。同时，闲暇时间对行为人的效用也具有边际递减的特性，即： $\frac{db}{dz_2} > 0; \frac{d^2b}{dz_2^2} < 0$ 。

我们建立了一个区别于传统消费函数的、静态的闲暇消费函数  $C = C(Y, z)$ ，其中： $Y$  代表行为人的总收入； $z$  代表除工作以外的闲暇时间。该函数说明，经济行为人的消费中包含了两类类型的消费，一种是“瞬时消费”，即通常对物质产品和瞬时可完成的劳务或服务的消费，记为  $C(Y)$ 。在一次消费中还可能同时存在另一类型的消费，我们称之为“耗时消费”<sup>⑦</sup>，如消费一次耗时 15 天的旅游、参加一次研修等，这些消费所耗用的闲暇时间形成对工作时间的替代并对行为人的生产率或工资率产生影响，影响了消费者的收入水平，进而影响消费额，因此，该类消费受到闲暇时间的限制，在此记为  $C(z)$ 。为了分析简便，我们可以认为消费者的消费函数可以表示为加性可分的形式，即消费是对“瞬时消费”和“耗时消费”二者的组合，于是总的消费函数就是瞬时消费和耗时消费的一个线性组合：

$$C(Y, z) = \theta C(Y) + (1 - \theta)C(z) \quad \text{其中: } 0 \leq \theta \leq 1 \quad (2.1)$$

我们假设：经济是竞争性的；经济行为人的集合是一个数量为  $N$  的连续统即经济中的人口规模非常大。并令  $\omega$  为消费者的平均工资率， $L$  为工作时间，总时间为 1。

瞬时消费  $C(Y)$  就是传统消费函数形式的消费函数，且有

$$\text{短期消费函数: } C(Y) = C_0 + k_1 Y \quad (2.2)$$

$$\text{长期消费函数: } C(Y) = k_1 Y \quad (2.3)$$

其中： $k_1$  是瞬时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 $C_0$  是短期内瞬时消费的自发消费，即负储蓄。

闲暇时间和耗时消费  $C(z)$  存在类似的正比关系，可设定为：

$$\text{短期消费函数: } C(z) = C'_0 + k_2 z \quad (2.4)$$

$$\text{长期消费函数: } C(z) = k_2 z \quad (2.5)$$

其中： $k_2$  是耗时消费的边际消费倾向， $C'_0$  是短期内耗时消费的自发消费。

④ 确切地说，这里的闲暇时间仍然包括享受型闲暇时间和受教育闲暇时间两类，即  $z = z_1 + z_3$ 。

⑤ 由此，闲暇也能间接增加人均产出即劳动生产率。用一个具体而简单的 Cubb-Dauglass 生产函数表述如下：

$Y = AK^\alpha L^{\beta(z)}$ 。其中，闲暇  $z$  提高了  $\beta$ 。将上述函数人均化则有  $y = \frac{Y}{L} = AK^\alpha L^{\beta(z)-1}$ 。所以，闲暇  $z$  提高了  $\beta$ ，通过上式表现的机制， $z$  的提高也提高了生产率  $y$ 。

⑥ 我们关于闲暇时间促进边际产出率的结论和杨小凯（2003）的相关结论相类似，但解释却不同。杨小凯认为闲暇时间给“闲暇和工作可得到的有限时间施加更多压力，迫使人们选择更高水平的分工水平来提高生产率（杨小凯，2003，P310），而我们认为闲暇时间尤其是享受型闲暇时间不是如此被动地促进生产率的提高，更通常的是，闲暇时间做为一种对身心有益、增进知识进而促进行为人生产率提高的要素直接、主动地促进了人均产出率的提高。另外，杨小凯对结论的解释中回避了闲暇时间中的活动如果是“不好”的，对生产率和产出率的负作用。

⑦ 指占用不可忽略的闲暇时间的消费。

考虑长期内的总消费函数，将(2.3) (2.5)式代入(2.1)式，得：

$$C(Y, z) = \theta k_1 Y + (1 - \theta) k_2 z \quad (2.6)$$

又由行为人的预算约束可得： $Y = \omega(1 - z)b(z)N$ <sup>⑧</sup> (2.7)

(2.7)代入(2.6)式得： $C(Y, z) = C(Y(z), z) = \theta k_1 N \omega(1 - z)b(z) + (1 - \theta)k_2 z$  (2.8)

(2.8)式就是包含了闲暇消费的完整消费函数。由(2.8)式可推出：

$$\begin{aligned} \frac{\partial C}{\partial z} &= \theta k_1 N(\omega b' - \omega b - \omega b' z) + (1 - \theta)k_2 \\ &\cong \theta k_1 N(\omega b' - \omega b - \omega b' z) \quad (\because N \text{ 足够大}) \end{aligned} \quad (2.9)$$

其中： $b' = \frac{db(z)}{dz}$ 。考察(2.8)式和(2.9)式，可以得到如下命题：

**命题 1：**当只考虑经济行为人的消费量时，闲暇时间对居民总体消费同时存在正向拉动和负向抑制两种作用。

因此说，闲暇时间既不像某些新古典经济学学者认为的那样一定会形成对物质消费的替代，也不一定能必然拉动居民消费上涨，而是根据闲暇时间对消费者收入的具体影响而反映出不同的效应。

### 三、考虑闲暇时间的最优消费增长

第二部分的模型很好地说明了在考虑居民的闲暇时间以后，居民的消费额会出现如何的变化。但是，该模型是静态的，并且简化了外部参数环境以及经济约束路径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在现实经济中，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是在个人预算约束和效用最大化的准则下进行的。为了更好地逼近现实，我们构造一个动态闲暇时间—消费模型，以此来讨论行为人在自己的收入动态变化时，闲暇时间对最优消费增长的作用。

给定一个经济中有  $N$  个典型无限寿命的行为人，且市场连续出清、完全竞争、具有完全预见性和不存在外部性效应。消费者的集合是一个数量为  $N$  的连续统。

**假设 1.** 该经济中只有一种产品，该产品被直接用于产品消费或积累用于投资形成资本。

**假设 2.** 不存在资本调整成本，也不考虑资本折旧。

**假设 3.** 经济体的交易效率系数为 1，即每购买一个单位的产品，买者可以得到全部产品，交易过程不会造成产品的损耗。

**假设 4.** 依据效用损失计算的消费品的管理费用为零。

**假设 5.** 闲暇时间是外生给定的。

消费者的效用取决于他对商品的消费和对闲暇时间的享受。为了更精确地表达闲暇时间的性质，我们将闲暇时间分为两种，一种是“必要闲暇时间”，指为了维持正常的生活而必备的闲暇时间，如正常睡眠的时间，维持正常生活的家务劳动时间，将此类闲暇时间记为： $z_1$ <sup>⑨</sup>。在预算（时间）约束中，由于必要型闲暇时间  $z_1$  伸缩空间很小，因此可以将之可以看作作为一个常量。另一类闲暇时间是“享受型闲暇时间”，如参加为期 2 年的脱产硕士研究生教育、参加一次长途旅游等等，此类闲暇活动通常有直接或间接的成本，即它是有价格的，将此类闲暇时间记为： $z_2$ ，其价格记为： $P_{z_2}$ 。于是，所有行为人的生命周期总效用函数可表达为  $U = \int_0^{\infty} e^{-(\rho-n)t} U(c, z_2)$ ，消费和闲暇时间仍然满足边际效用递减的特性。

<sup>⑧</sup> 为分析简明，此处不考虑非工资性收入。通过代数运算可知，加入非工资收入后，并不改变结论的性质。

<sup>⑨</sup> 由于此类闲暇时间不涉及交易或属于自给自足行为，因此我们不考虑其价格。其实，即便考虑其价格，可以发现，由于这种活动的收、支是平衡的，在预算约束方程的两边可以互相抵消，因此考虑其价格与否并不影响分析过程。

经济行为人总体效用最大化的决策问题可以被规定如下：

$$\begin{aligned} & \text{Max} \int_0^{\infty} e^{-(\rho-n)t} U(c, z_2) & (3.1) \\ \text{s. t.} & \dot{m} = (r-n)m - c - b(z_2)\omega L & (\text{预算约束}) \\ & L + z_1 + z_2 = 1 & (\text{禀赋约束}) \\ & m_0 = m(o) & (\text{初始条件}) \\ & c > 0, z_1 > 0, z_2 > 0 & (\text{边界规则}^{\text{⑩}}) \end{aligned}$$

其中：控制变量和状态变量都是时间的函数； $\omega$  为消费者的平均工资率， $m$  为消费者的人均资产性收入，即来自于租金、股息、利息等的非工资性收入<sup>11</sup>。L 为工作时间，总时间为 1。r 为资产收益率， $\rho$  为行为人的时间偏好率；n 是外生的人口增长率。

$b(z_2)$  是享受型闲暇时间对人均工资率的影响函数，其意义和解释同本文第二部分的  $b(z)$ ，只是这里用享受型闲暇时间  $z_2$  代替了闲暇时间  $z$ 。同理， $b > 0$  且  $\frac{db}{dz_2} > 0; \frac{d^2b}{dz_2^2} < 0$ 。

问题(3.1)的 Hamilton 函数为： $H = U(c, z_2) + \lambda[(r-n)m - c - b(z_2)\omega(1-z_1-z_2)]$

其中： $\lambda > 0$ ，是用当前效用度量的收入的影子价格。

将  $c$  和  $z_2$  作为控制变量，由 Hamilton 最大化的最优条件和欧拉方程可以得到

$$g = \frac{\dot{c}}{c} = \frac{U''_{cz_2} z_2 + (r-\rho)U'_c}{-U''_{cc} c} \quad (3.2)$$

其中： $U'_c = \frac{\partial U}{\partial c}$ 、 $U''_{cz_2} = \frac{\partial^2 U}{\partial c \partial z_2}$ 。  $\dot{z}_2 = \frac{dz_2}{dt}$ ，表示享受型闲暇时间的增量，它是  $b(z_2)$  的边

际递减的增函数。

由(3.2)式可得命题 2

**命题 2：**若工资率、人口增长率、利率和时间偏好率为外生给定，则当资产收益率大于时间偏好率时，享受型闲暇时间的增长可以保证消费增长率的持续增长；当资产收益率小于时间偏好率时，享受型闲暇时间对最优消费增长率的作用取决于边际闲暇时间对行为人边际效用的影响程度大小。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闲暇时间对消费增长的影响效应取决于外生参数环境  $(r, \rho)$ ，这类似于索罗 (Solow, 1956) 增长模型中经济增长率取决于外生的储蓄率。在参数环境中，通常  $r$  是客观因素，而  $\rho$  是主观因素，受到居民消费习惯、消费观念、经济形势等诸多因素的影响。

## 四、对中国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部分，我们尝试用我国的实际数据来检验命题 1 和命题 2 所论述的问题在我国所导致的具体结果，并根据命题的理论依据和我国的实际来解释实证的结果。

由于在我国，农民的闲暇时间不能很好地界定与统计，同时，农民的闲暇时间对其收入和效用的影响显然不如城镇居民那样明显。所以本文的数据和实证检验是针对我国城镇居民的，没有考虑进农民的相关数据。在“三农”问题得到较好解决的一段时间后，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农民的数据包含进来，重新检验我们的命题。

(一) 数据来源

<sup>⑩</sup> 本文假设只有内点解，不做超边际分析。

<sup>11</sup> 此处为了更明确地揭示享受型闲暇时间对行为人的作用，我们在行为人的总收入中考虑进了资产性收入。

在数据选择方面，从数据的真实性和可获得性出发，本文样本点用中国的年度数据来代替个体数据，以求大致反映城镇居民（他们受到官方闲暇时间安排制度的约束）闲暇时间与消费的关系。本文包括了从 1987 年到 2003 年共 17 个观测点。

#### 1、城镇居民消费总额

城镇居民消费总额的当年数据来源于各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本文用居民消费品价格指数（以 1978 年为基年）对之进行了调整。

#### 2、享受型闲暇时间

为了降低享受型休闲时间的统计难度，我们采用对公共假期加权的方式来对总的享受型休闲时间进行统计。因为城镇居民对闲暇消费与闲暇时间具有正相关关系（张辉，2002），于是，我们将城镇居民每年的享受型闲暇时间（即公共假期）以当年的闲暇消费额为权数进行加权调整。其中，闲暇消费包括了城镇居民国内旅游花费、文化、娱乐和体育花费。国内旅游总花费从《中国旅游业统计公报》中“国内旅游业绩”取得。文化娱乐体育总收入或消费从《中国统计年鉴》“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年消费性支出”中的“娱乐教育文化服务”一项中取得。

#### 3、城镇居民收入与资产性收入

城镇居民收入数据来源于各年《中国统计年鉴》，用通货膨胀指数（以 1978 年为基年）对各年的 GDP 进行了调整。

城镇居民资产性收入从《中国统计年鉴》中“城镇居民平均每人全年家庭收入来源”中“财产性收入”中取得。该数据也经过了同样口径通货膨胀指数的调整。

#### 4、工资率

工资率的数据基于对平均工资的计算。城镇居民平均工资的数据来源于各年的《统计年鉴》，本文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指数”对之进行了调整。职工工作时间统一按 8 小时/天计量，因此工资率就等于平均工资除以 8 小时工作时间。

#### （二）实证结果

令  $X$ =城镇居民的消费额， $Y$ =城镇居民收入， $H$ =城镇居民的享受型闲暇时间， $W$ =城镇居民的工资率。通过对数据的检验分析<sup>12</sup>，我们发现利用 VEM 的方法对变量进行的回归，残差可以趋于平稳。在以上分析基础上，可以知道变量间存在弱协整关系。利用信息准则从一般到特殊的精选方法，得到回归方程如下：

$$\ln X = -0.6941670228 \ln X(-1) + 0.9294540474 \ln H + 0.8033369507 \ln W(-2) + 4.551903785 \ln Y - 4.777618131 \ln Y(-1) \quad (3.1)$$

回归的阿凯克信息准则 Akaike info criterion = -2.853808 和舒瓦茨信息准则 Schwarz criterion = -2.672947，已经达到最小。此外，对回归方程做条件异方差检验和怀特异方差检验的结果也表明残差已经没有异方差，Q 统计量显现残差已经稳定。

从回归方程(3.1)可知，享受型闲暇时间对城镇居民消费有促进作用，享受型闲暇时间每增长 1%，即刺激当前消费增长 0.93%。收入水平仍然是影响消费的最主要因素，居民收入  $Y$  每增长 1%，即刺激当前消费 4.55% 的增长。同时，前两期工资率每增长 1%，可以拉动当前消费增长 0.8%，这说明工资率对消费的影响存在明显的时滞，要通过两期才能反映到居民收入水平上，进而产生对消费的直接影响。

##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认为，我国现在建设和谐社会的过程，居民的消费结构和消费偏好将发生重大变化，对以

<sup>12</sup> 包括单位根（ADF）检验、数据异常值的调整、格兰杰因果检验、变量自回归（VAR）的方法、VEM 法等，鉴于篇幅有限，此处省略分析过程。

文化、旅游、教育等为主要内容的闲暇消费将成为居民消费的主体部分。因此，有必要研究闲暇时间对消费增长的影响。为此，本文首先建立了一个静态的闲暇时间—消费函数模型，说明如果只考虑行为人消费量的多少，则由于闲暇时间影响行为人的产出率或工资率，所以闲暇时间对消费量的增长同时具有促进和抑制作用，随后，我们用一个动态的最优化模型证明了，当外部参数环境给定时，资产收益率相对于时间偏好率的相对大小和闲暇时间对行为人边际效用的影响大小决定了闲暇时间是保证消费的均衡增长得以持续还是将抑制该种增长。最后，我们用计量方法对中国的数据进行检验与分析，表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近 15 年来，闲暇时间对居民的消费增长有明显的正向作用。

基于以上分析，结合我国的国情，我们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 1、鼓励与提倡终身学习的观念、加大继续教育的力度。

从理论模型的分析我们知道，当闲暇时间里从事的活动促进行为人的产出率和工资率时，闲暇时间的增大能促进消费增长。接受继续教育、进行业余学习是闲暇时间的重要内容，通过该项内容，能直接促进行为人生产效率和工资率的提高，因此，从提高生产效率和消费增长率的角度出发，我们应该向发达国家学习，在全社会建立完善的“3L”（Life Long Learning）体系，即终身学习的体系，建立门类完善的职业学院、在职培训系统和夜校等，建立健全其认证系统、监督体制，同时也大力引导企事业单位接纳和认同持该种学历的各类人员。

#### 2、进一步重视物质文明建设中的精神文明建设，明确其重要的经济意义。

我们理论模型的一个突出之处在于重视闲暇时间对个人产出的影响。积极、健康、向上的闲暇消费或活动，将促进个人的产出率提高，而违反社会评价体系、不健康的闲暇活动，将损害行为人的生产效率，这也将通过影响行为人的收入水平和边际效用而影响消费增长。因此，我们必须在全社会进一步明确，建设精神文明对建设物质文明的重要经济意义，建设精神文明在后工业化的和谐社会将直接对物质文明的建设产生直接的、积极的影响，精神文明的发展是保证物质文明得以持续、稳定增长的重要因素。

#### 3、继续提高人民消费多样化、丰富化的程度，鼓励多种消费方式。

闲暇时间增进了我国的消费增长，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居民对多样化消费的倾向在改革开放后逐年提高（即本文第三部分模型中的  $\rho$  值逐年减小了）。因此，鼓励居民对多样化消费的欲望、鼓励居民多样化的消费方式，那么闲暇时间的增多，不仅能够提高行为人的效用和效率，还可以促进消费增长和经济增长。

#### 4、促进人民收入结构的多元化、增大服务业的比重。

从理论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资产性收入对消费增长有积极作用，同时，在闲暇时间里行为人所消费的服务或产品大多是服务业所提供的服务或产品，如娱乐、旅游、教育、金融等服务或产品。通过提高行为人收入结构多元化的程度，同时加大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能够在增大闲暇时间的同时保证消费增长率的持续提高，促进经济健康、持续、稳定增长。

#### 主要参考文献：

- 郭鲁芳：《休闲消费的经济分析》[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4年第4期。
- 杨小凯：《经济学：新兴古典与新古典框架》[M]，2003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张辉：《旅游经济论》[M]，2002年，旅游教育出版社
- 张旭昆、徐俊：《消费的闲暇时间约束模型与假日经济现象》[J]，《经济评论》2001年第5期。
- Arrow, K. J., “The Economic Implications of Learning by Doing”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62, 29, 155-173
- Hirsleifer, J., “Investment, Interest and Capital” [M], 1970, Englewood Cliffs: Prentice-Hall.
- Becker G S, “A Theory of allocation of time” [J], Economic Journal, 1965, 75, 497-517.

Becker G S, “The Economic Approach to Human Behaviour” [M], 1976,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liss, C. J., “Capital Theory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Income” [M], 1975, Amsterdam: North-Holland.

Buchanan, J., “The Return to Increasing Returns” [Z], in Buchanan, J. and Yoon, Y. eds The Return to Increasing Returns, Ann Arbor, 1994,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 Leisure Time and Consumption Growth

— *the Positive Analysis to P.R. China*

Wei-Xiang

(*Chian Renmin Universit, 100875; Beij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Beijing,100024*)

Hui-Puke

(*Beij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Beijing,100024*)

**Abstract:** The paper creates a leisure-consumption function including leisure time variable. And, based on static analysis, we analyze the effect of leisure time on resident consumption, what's more we testif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eisure time and consumption mounting through optimizing model under dynamic budget constraint. Then, we quote the data in China to verify our proposition of theoretical model, and explain the result of positive analysis. Finally, we give some suggestions in related policies.

**Key Words:** Leisure time; Consumption Growth; Rate of Output; dynamic analysis.